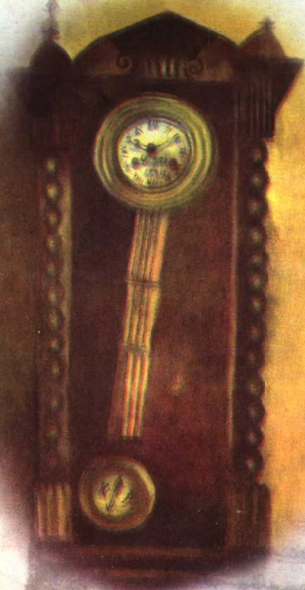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马克思

米资祥 编著



海南出版社

7
X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马克思

米资祥 编著

海南出版社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主 编：本书编委会

责任编辑：刘文武 李秋云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社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

印 刷：河北省沙河第二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325.75

字 数：6784 千字

版 次：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ISBN7—80617—735—3/K·38

定 价：(全套 90 本) 358.00 元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马丹梅 袁 兵

编 委：邓先明 刘叶青

乔晓燕 叶文殊

黄少云 李秋云

丁 岚 刘 力

葛 兰 王忠斌

尚 巍 卢舜茜

目 录

第一章	青年时代	(1)
第二章	初登社会舞台	(7)
第三章	在巴黎的岁月里	(22)
第四章	亡命布鲁塞尔	(29)
第五章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	(44)
第六章	流寓伦敦	(57)
第七章	在 1857 年以后的危机中	(70)
第八章	在国际工人协会创始时期	(79)
第九章	在“国际”的盛衰时期	(93)
第十章	在最后的岁月里	(110)

第一章 青年时代

1818年5月5日，卡尔·亨利希·马克思生于莱茵省特里尔城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祖父马克思·列维是一名犹太律法学家，他的父亲希尔舍·卡尔·马克思，后改名亨里希·马克思，生于1782年，同一位荷兰女子罕丽·普列斯堡结婚，生育多名子女，但从一确定继承人的文件中发现，只有卡尔·马克思和三个女儿索菲亚、爱米利、路易莎存活。

卡尔·马克思的童年是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度过的。他的聪慧、他的无与伦比的天赋是他父亲的希望，认为有朝一日这些才能最终将用于造福人类的事业；他的母亲虽然对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也关怀备至，却完全被家务缠身，对于卡尔·马克思的成长来说，母亲只给了他一个温柔的怀抱、一个和蔼宁静温暖的家庭，而根本没有参与过儿子的思想斗争，——只是有时不禁以一个母亲的心情为她的卡尔深思，想到假如他走上了人生的正轨后，他的成就会有多大。后来，卡尔·马克思似乎同他母系的荷兰亲属，特别是同他的一位舅舅菲力浦斯接近起来，这人在他生活困难的时刻曾经在物资上帮助过他。

应该说，卡尔·马克思继承犹太人的聪明、智慧、坚韧

和荷兰人的勇敢、无畏、向上精神。有时候，就连马克思的父亲也怀着忧惧与期盼的矛盾心情注视着爱子不安于现状的灵魂。但遗憾的是他在卡尔刚满 20 岁几天后去逝了。使他感到忧虑的不是那种梦想儿子有一个光辉前途的家庭妇女式的渺小眼光，而是对儿子性格中某种磐石般坚硬的东西所感到的隐隐的惊恐与不安，这种坚韧不拔的性格、犀利的思想，是和他自己的柔和秉性绝然不同的。

中学生活曾经给予正在成长的马克思一些什么，就不清楚了。卡尔·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任何一个中学同学，而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所写的关于马克思的回忆。他相当早就在本城的中学毕了业；他的毕业证书上注明的日期是 1835 年 8 月 25 日。证书上照例地写着对这个有才华的青年的祝福，以及关于他的各科成绩的老一套的考语。但是，毕业证书上特别指出，卡尔·马克思能很好地翻译和解释古典作品中最艰深的地方，特别是那些与其说难在文词的晦涩，无宁说难在内容和思想的逻辑关系的地方；他的拉丁文作文表现出丰富的思想和对题义的深刻理解，不过与主题无关的议论往往过多。

在毕业考试中，他的神学考得不好，历史学也考得不太好。不过在德语作文里他表述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在主考人看来是“很有意思”的，而在我们看来更是意味深长的。这篇作文的题目是《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主考人在评语中批示说：“卡尔·马克思的文章以丰富的思想和完美谨严的结构而引人注目，但是作者在这里又表现了他所常犯的一个毛病——过分追求文词的华美和生动。”下面接着一字不漏地摘引了一句原话：“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

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序上被规定了。”可见，还在少年马克思的头脑中，就已闪现着一种思想的火花，这种思想的全面发挥就是他在成年时期的不朽贡献。

1835年秋天，卡尔·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看来，在那里的第一年与其说是在研究法学，不如说只是“住大学”。

从马克思父亲的信中所反映的情况来判断，他是在纵情享受青春的欢乐。后来，当父亲发怒的时候，他曾在信中指責儿子的“放浪形骸”。但这时，父亲还只是抱怨儿子给他寄来一些“既没有关联，也没有结算的卡尔式的帐单”。不过说到帐单，这位货币流通的经典理论家就是到后来也从来没有弄清楚过。

在波恩的充满欢乐的第一年结束时，马克思正好达到18岁的幸福年龄；这时，他同他儿时的一位姑娘订了婚。这位姑娘是他姐姐索菲亚的密友，索菲亚是把这两颗年轻的心撮合在一起的人。马克思的订婚，虽然看起来也是学生时代的一种轻率的举动，实际上却是这位天生的领袖所获得的第一个最辉煌的胜利。马克思的父亲最初认为儿子的胜利是完全“不可思议的”，直到他在卡尔的未婚妻身上也发现有“某种天才的东西”，发现她能够做出一般女孩子所做不到的牺牲时，他才理解这次胜利的意义。

确实，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不但生得异常美丽，而且具有非凡的才智和优秀品德。她比卡尔·马克思大四岁，但也只是二十出头。她正当美貌年华，身边自然围绕着许多爱慕者，并且，以她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员的女儿，无疑是有会有一个辉煌的前途。而她却为了一个如老马克思所说的

“艰险莫测的未来”牺牲了所有这一切。马克思的父亲有时甚至觉得，那些烦忧着他的惊恐和不安，在她的心灵里也存在着。但他却深深地相信这位“天使”，这位“迷人的女郎”。

未来确实比亨利希在最不祥的预感中所想象的还要艰险莫测。然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却以毫不动摇的勇气，在最艰苦的坎坷生活中忠于她所选择的人。也许，就通常的含义来说，她并没有帮助卡尔·马克思减轻生活的重担，因为她从小娇生惯养，不是总能像一个饱经风霜的无产者妇女那样来应付日常生活上的微小困难。但是，就另一种更高的含义来说，在理解他丈夫的事业方面，她却是他当之无愧的伴侣。她的那些保存下来的信都散发着真正的女性的气息。她具有歌德笔下的人物的那种性格，无论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下，——从欢乐的日子里的谈笑风生，直到穷困夺去她的孩子。燕妮的美常使她丈夫引以自豪；在1863年，他们共同生活了几乎整整20年之后，他回到特利尔去安葬母亲时写信给她说：“每天我都去瞻拜那个圣地——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在罗马街）；这所小房子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能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幸福的青年时代，曾有一个时期它收藏过我最珍贵的宝物。而且每天从四面八方都有人来问我，特利尔的这位第一美人和舞会上的皇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当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记忆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时，他简直有说不出的高兴。”当马克思弥留之际，这位与感伤情绪一向无缘的人，却怀着深沉的悲痛谈到这位妇女所带给他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一对年轻人没有征得女方父母的同意就订了婚，这种情况使马克思的正直的父亲担受了不少惊恐。不过很快威斯

特华伦家也就同意了。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虽然有着显赫的身家地位，却既不属于易北河东岸的容克地主，也不属于旧普鲁士官僚阶级。他的父亲菲利浦·威斯特华伦是德国军事史上的一位声名赫赫的人物。他在不伦瑞克的斐迪南大公手下担任过机要秘书。斐迪南大公曾经率领一支英国出钱雇佣的杂牌军，在七年战争期间胜利地抗击了野心勃勃的路易十五和庞巴都侯爵夫人，保卫了德意志西部。菲利浦·威斯特华伦成了公爵的参谋总部的实际首脑，尽管全军中有许多德国将军和英国将军。他的功绩受到如此的重视，以致英王有意任命他为全军的侍从武官长，然而威斯特华伦谢绝了这个建议。他仅仅接受了赐给他的贵族身分；他这样做，也只是出于那曾经迫使海德尔和席勒忍受同样屈辱的同一个理由。菲利浦·威斯特华伦之所以委曲求全，是为了能够和一位苏格兰男爵的女儿结婚；这位姑娘是到斐迪南公爵的军中来探望她的姐姐——英国策应军一位将军的妻子的。

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就是这对夫妇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历史声名，而他的母亲的祖先的名字也唤起了伟大的历史回忆：直系祖系当中有一个人在苏格兰争取宗教改革的斗争中被处以火刑；另一祖先，阿契波德·阿盖尔伯爵，在反抗詹姆斯二世时期被当作叛乱者斩首了。这样的家庭传统本身就使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脱出了狂妄自大的官僚的氛围。最初他不在不伦瑞克公爵手下任职，甚至当这个小小的公国被拿破仑合并于威斯特伐里亚王国的时候，他还打算离职。他显然不大重视那些世袭的维尔夫们，却较为关心法国征服者的那些改革。但是对于外国统治本身，他却也

抱着否定的态度，因此在1813年遭到达乌元帅的严厉惩处。以后，他在萨尔茨维德尔做县长，在那里，于1814年2月12日生了女儿燕妮，两年以后，又被调到特利尔去做枢密顾问官。因为，普鲁士国家的首相哈登堡在初斯励精图治，认识到应当把一些不怀有容克偏见的精干人物派到莱茵省去。

卡尔·马克思终生都对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怀着十分尊敬和感戴的心情。他称威斯特华伦为“父亲般的亲爱的朋友”，并且向他报以“子弟之爱”，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威斯特华伦是他的岳父。威斯特华伦能够从头到尾背诵荷马诗中的许多段，能够用德语和英语背诵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剧作。在“威斯特华伦家的老宅子”里，卡尔·马克思获得了他父母的家所不能给他而学校更不能给他的精神食粮。他自己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是老威斯特华伦所钟爱的孩子，而威斯特华伦同意他们的订婚，还可能是由于他想到自己父母的美满婚姻。因为，在世人的眼里，以一个古老贵族的男爵世家出身的姑娘嫁给一个的机要秘书，也并不是一个门当户对的姻缘。

第二章 初登社会舞台

还在卡尔·马克思订婚以前，他的父亲就决定让他到柏林去继续求学了。

卡尔的订婚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加强了老马克思的这个决定。他是一个谨慎的人，由于他们的结婚将要推迟到很久以后，因此他认为使这对爱人彼此离得远一些是有益的。他之所以选择柏林，也许是出于普鲁士的爱国主义，也许还由于柏林大学没有那种寻欢作乐的习气，而在这位关怀备至的父亲看来，卡尔·马克思在波恩已经十足地沾染了这种习气。关于柏林大学，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曾说过：“比起这儿的习艺所来，其他的大学简直就是酒店。”

无论如何，这个青年学生自己并没有选择柏林作为进修大学学业的地方。卡尔·马克思喜欢他的阳光明媚的故乡，而对于普鲁士的首都则终生都是厌恶的。黑格尔哲学虽然在它的创立者死后比他生前更加风行于柏林大学，然而它也不能把卡尔·马克思吸引到柏林去，因为当时黑格尔对他来说还不完全是陌生的。何况，他还必须同他所热恋的姑娘分离。不错，他曾经答应过，他要以她同意将来和他结婚为满足，而暂时控制一切感情的流露。但誓言总是“写在水上的”，恋人

们的这一类誓言尤其是如此。马克思后来告诉他的孩子们说，由于对他们的母亲的爱，他在那些年里简直如痴如狂，而在他得到允许和未婚妻通信以前，他那青春的热情始终无法平静下来。但是，直到他来到柏林一年以后，他才接到她的第一封信。

1836年10月22日，卡尔·马克思进入柏林大学。但是他对那里的课程似乎并不十分感兴趣。在9个学期当中，他只不过修了12门课程，主要是法学必修课，而且就是这12门课程，他大概也很少去听讲。在正式的教师当中，只有爱德华·甘斯一人对卡尔·马克思的精神发展有过一些影响。他听甘斯讲授刑法和普鲁士国家法，而甘斯本人曾证明马克思在听他的课时是“极为勤奋”的。但考语照例总要夹杂一些个人情面的成分。比这样的考语更有说服力的，是马克思在最初几篇论文中跟历史法学派所进行的无情论争。富有哲学修养的法学家甘斯也曾斥责了这个学派的偏狭和愚钝，以及它对法律 and 立法的发展的有害影响。

不过，据马克思自己说，他在大学修法学课程只是次要的；他认为历史和哲学才是主要的课程，但就是这两门课程他也很少去听讲，而仅仅选修了加布勒尔所开的必修课逻辑学。加布勒尔是黑格尔的正统继承者，然而也是黑格尔的所有平庸的附和者当中最平庸的一个。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地灌输的话，就是20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

初到柏林的时候，马克思沉溺在一个“新的世界、爱情的世界”中。“沉醉于爱情而希望渺茫的”他，把自己的感情

倾泻在写满了三册的诗篇中，这些诗篇都是献给“我亲爱的、永远有着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这些诗到达燕妮手里时已经是1836年12月，而她就像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在寄往柏林的信中所说的，“含着悲喜交集的眼泪”读了这些诗。一年以后，作者本人在写给父母的一封长信中，对自己的缪斯的产儿作了十分苛刻评判：“模糊而不成形的感情；不自然；纯粹是从脑子里虚构出来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完全对立；修辞上的斟酌代替了诗的意境……”。要知道，开列这张罪状的正是这位青年诗人本人啊。虽然他也附带声明说，在这些诗中“或许有某些热情和对大胆飞翔的追求……”，但是如果这些可嘉的品质还能够作为减轻罪状的条件，那也只是就席勒的那些“劳拉之歌”的意义和程度而言。

总的说来，这些青年时代的诗作散发着平庸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很少响彻着真实的音调。而且，诗的技巧是笨拙的，这种情况在海涅和普手顿之后是不应该再出现的。这样，马克思表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的高度艺术才能，一开始就是沿着一条奇特的道路发展的。就语言的气势和生动来说，马克思可以和德国文学上最优秀的大师媲美。他也很重视自己作品的美学上的谐调性，而不像那些浅陋的学者那样，把枯燥无味的叙述看成是学术著作的基本条件。但是，在缪斯放在马克思的摇篮里的许多天赋之中，毕竟没有韵文的才能。

不过，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母的长信中说，诗歌只能是而且也只应该是一种附带的事。他认为自己的本分是研究法律，而他最迫切地愿望是想在哲学方面试试自己的力量。他研究了海尼克修斯、提波和各种典籍，把罗马法全书的头两卷译成德文，并且试图在法的整个领域内创立一

种法哲学体系。这部“倒楣的著作”，据他说，已经差不多写到300印张之多，不过这个数字可能只是一个笔误。最后，马克思看出“这全盘是一个错误”，便投入了哲学的怀抱，打算创立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是随后他又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这期间，他养成了给所有读过的书——例如莱辛的《拉奥孔》、佐尔格尔的《艾尔温》、文克尔曼的《艺术史》、路登的《德意志人民史》——写摘要的习惯，并且在页边空白处批注自己的感想。同时，他还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奥维狄乌斯《哀歌》，并且开始自学，也就是说依靠语法书学习英语和意大利语，虽然一时收不到什么效果。他还读了克莱因的《刑法》和他的《编年记》，以及所有的文学新作，不过后者只是顺便读读罢了。

这第一个学期的结果是，“熬过了许多的不眠之夜，进行了许多次战斗，经受了许多的内部和外部刺激”，然而所得甚少。在这个期间，马克思抛开了大自然、艺术和整个世界，疏远了朋友。加之，他的年轻的身体疲劳过度，因此他遵照医嘱迁居到施特拉劳去，这地方当时还是一个安静的小渔村。在那里，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重新开始紧张的精神搏斗。在第二个学期里，他也吸取了极为广博的各种知识，但是在学习方面，黑格尔的哲学越来越明确地成为变换不息的现象中的一个固着点。当马克思初次接触到黑格尔哲学的片断时，他并不喜欢它的那种“古怪而粗犷的格调”；但是在又一次生病的时候，他从头到尾地研究了它，并且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在那里，通过思想论争，他越来越接近于这个“现代世界哲学”，不过，他内心的一切丰富的声音当然不免静止下来，而“在这样多的东西遭到否定之后”，

他陷入了“一种真正的讽刺狂”。

卡尔向自己的父母倾吐了这一切，并且在信的结尾处请求允许他立刻回家，而不要像他父亲以前那样等到第二年复活节的时候。他希望向父亲诉说他精神上的“极度动荡不宁”。只有在父母的“慈颜”之前，他才能平息那些“不安的幽灵”

那时已经病魔缠身的父亲，又在儿子身上看到那个老早就曾使他担忧的“魔”。自从他把“某人”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钟爱以来，自从一个非常可敬的家族同意缔结爱女遭遇生活的坎坷的姻缘以来，他更是加倍地惧怕这个魔影了。他也绝不致于固执到要给儿子规定生活的道路，只要卡尔能够选择一条使自己有可能完成“神圣的天职”的生活道路。但是这位父亲现在只看见前面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海洋，而没有一个安全的碇泊之所。

因此，尽管亨利希·马克思很“软弱”，——这一点他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还是决定“破题儿严厉一番”。他在12月1日的回信（这是一封以他所特有的方式措词“严厉的”回信）中，就用了一种夹杂着沉痛的叹息的过分夸张的词句。父亲问卡尔是怎样履行他所承担的职责的，接着自己回答说：“让上帝来判断吧！毫无秩序；杂乱无章地涉猎各门学问；在油灯的昏暗光下胡思乱想；不是拿着酒杯撒野，而是穿着学者的睡衣、蓬头散发地在那里撒野；愁眉不展地落落寡合，不近人情，甚至连自己的父亲也毫不关心。处世之道只局限在肮脏的小屋里。那里，在极端的杂乱无章中，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含泪书成的温谕，大概都被当作卷烟纸使用了，当然，这总比漫不经心地让它们落到不相干的

人手里要好些。”写到这里，父亲被悲伤压倒了，为了保持严厉无情的态度，他不得不服用医生给他开的药丸来自持。接着他严厉地训斥了卡尔的枉费：“就好像我们是财主一样，少爷一年之内，不顾一切规劝，违反一切习惯，胡乱花了差不多700塔勒，而有钱人还花不到500塔勒”。当然，卡尔并不是一个挥霍无度的浪荡儿，但是一个几乎每星期都在创立新体系和摧毁旧体系的人，难道会去注意这些生活小节吗？大概是随时随地都有人欺骗他，随便什么人都把手伸到他的钱袋里去。

这封信是在1838年2月10日写的。那时亨利希·马克思刚刚在病卧5个星期之后起来。但是病情的好转并没有保持多久。他的病——肝病——又复发了，而在三个月之后，即1838年5月10日，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与世长辞了。死来得正是时候，它使父亲的心免于因痛苦和失望而逐渐破碎。

卡尔·马克思终生以真挚的感激心情怀念着自己的父亲。正像父亲曾经把对儿子的爱珍藏在内心深处一样，儿子也把父亲的形象铭记在心中，直到走进坟墓。

从1838年春天丧父以后，卡尔·马克思又在柏林住了3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同“博士俱乐部”的成员们交往，而这个俱乐部中的精神生活为他开辟了通向黑格尔哲学的道路。

黑格尔的学说当时还被认为是普鲁士的国家哲学。文教大臣阿尔坦施泰因和他的枢密顾问官约翰·舒尔采给予这个学说以特殊的保护。黑格尔把国家尊崇为伦理观念的化身，尊崇为绝对合乎理性的东西和绝对的目的本身。因此他认为国家对个人具有无上的权威，而个人的最高义务则是成为国家